

讲座丛书

第二编

◎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编

◎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中国典籍与文化

ZHONG GUO DIAN JI YU WEN HUA

第十辑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非外借

讲座丛书

第二编

◎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编

中国典籍与文化

ZHONG GUO DIAN JI YU WEN HUA

第十辑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十辑)/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11

(讲座丛书第二编)

ISBN 978 - 7 - 5013 - 6086 - 4

I. ①中… II. ①国… ②中… III. ①古籍—中国—文集
②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6860 号

书 名 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十辑)
著 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张珂卿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nlc.cn(邮购)

Website www. nlcpres. 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 2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6086 - 4

定 价 55. 00 元

编辑小组

陈红彦 谢冬荣 萨仁高娃

刘波 常冬心 李燕晖 刘婷

目 录

《论语》导读 / 韩 星 / 1

《论语》疑难问题新探 / 廖名春 / 33

《孟子》的仁政思想 / 鲁洪生 / 67

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 / 梁 涛 / 81

《老子》与黄老道家 / 曹 峰 / 103

庄子的精神自由与人生境界 / 尚学峰 / 139

《周易》：成书、历史影响及现代价值 / 杨庆中 / 165

《商君书》与公元前四世纪的秦国改革 / 杨振红 / 189

战国策士及其游说技巧 / 过常宝 / 219

韩 星

《论语》导读



韩星 1960年6月出生，陕西蓝田人。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分别获文学学士、硕士，历史学博士（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研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等多部专著，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社会兼职有：国际儒联理事及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河北省儒教研究会顾问、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顾问等。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一、孔子的生平事迹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孔子的祖先是商朝的宗室，到周朝时被封于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故可以说孔子是殷商的贵族后裔。西周初期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今商丘市睢阳区），建有微子祠。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孔子的先祖）即位。孔子家族后来移居鲁国，学界有两种说法：说法一，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因为家道破败，无力偿还所欠债务，逃至鲁国；说法二，是因为其曾祖父孔防叔与宋国当政大臣华氏不和，于是离开宋国，移居鲁国。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hé），是鲁国出名的勇士，虽跻身于贵族之列，但地位很低。娶施氏曜（yào）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嫡长子排行称伯，庶出长子排行称孟），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又在外纳颜氏第三女征在为妻，生孔子，因出生之前曾在尼丘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曰仲尼。

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施氏和叔梁纥的家人不喜欢征在母子，没有善待他们。颜征在被迫带着孔子离开，移居曲阜阙里，独自抚养孔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到了孔子17岁时，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孔子19岁成亲，娶宋国亓（qí）官氏的女儿为妻，次年生了唯一的儿子孔鲤。孔鲤比孔子早死，留有遗腹子孔伋。

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从小就跟着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孔子少年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牛羊畜牧）一类的小官。但他聪明好学，在20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

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1.9米以上）。臂力过人，远非后世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他从不以武勇和酒量自豪。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在社会上颇有名气。鲁昭公二十年（前522），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挠。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今济宁市汶上县一带），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不久又升为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部长兼检查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摄相事（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鲁定公十年（前500）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郚、鄆、龟阴等土地。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良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huī）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十三年（前497），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

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希望在别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 55 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六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十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而被人围困了五日后，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首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孔子在卫国时曾经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子路对此极有意见。

鲁哀公二年（前 493），孔子 59 岁，他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鲁哀公六年（前 489），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孔子 64 岁时又回到卫国，68 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孔子遂心一意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资料。69 岁时，独子孔鲤去世。71 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72 岁时，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鲁哀公十六年（前 479），孔子 73 岁，寝疾七日，不愈而亡。孔子讲学，学生多达 3000 人，其中著名的有 72 人。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事迹多见于其弟子们编成的《论语》一书。

按照现在人的说法，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等等。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撰《春秋》。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中国人

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教）文化圈。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辞行事的一部书，是中国人的“圣经”，是中国人修心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基石。不把这本书读懂、读通、读透，就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汉代，学童经过启蒙识字教育之后，便读《论语》和《孝经》，是古代人尤其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社会政治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南宋时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不仅成为古代士子的必读之书，也是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二、《论语》的题名

《论语》的书名，最初见于《礼记·坊记》。汉朝人引用《论语》或单称《论》，或单称《语》，或者称《传》或《记》。《论语》之所以题名为“论语”，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个解释较为稳妥。另外，《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概括出：（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①。宋代邢昺《论语正义》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邢昺的这个论断有些牵强，对《论语》的功用未免有些理想化，不过他说明了《论语》是一部有完整思想体系的著作。

三、《论语》的编著年代和作者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和作者，一般认为《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由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论语》是先秦古籍，为其门人弟子编撰，两汉学者对此多有记载，这在历史上本来没有疑问。如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引）；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谥》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孟子题辞》）。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各家的具体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编撰，而这些孔门弟子当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所以《论语》在先秦时期确已编辑成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具体是哪些弟子，唐代柳宗元注意到《论语》中有曾子临终前与弟子的对话（见《泰伯》），“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或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论语辩》二篇，载《柳河东集》）即认为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今人杨伯峻同意此说。宋代有学者指出《论语》一书实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故此书独二子以‘子’称”。清人崔述则认为《论语》成书当在孔子既没数十年

后，乃“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卷四《遗型》）。杨朝明则谓《论语》材料来自孔门众多弟子，而由子思具体辑录而成。但全书一些章节前后重复出现，可证编纂者也不是一人。梁涛参考了新出土的与《论语》有关的文献研究，认为柳宗元的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也道出一部分事实。有子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曾被子夏、子张等人推为孔子的接班人，在儒家内部一度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论语》的结集开始较早，那么很有可能，有子就是其最早的主持者。至于曾子，也是孔门中颇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在孔门弟子中年龄较轻，去世较晚，曾在结集的后期起过重要作用，《论语》一书可能就是完成于其弟子之手。《论语》中孔门弟子一般称名或字，而他二人称子，可作为其特殊身份的证明。总之，《论语》的成书乃是孔门内部有统一组织、弟子广泛参与、时间跨度较长（从孔子去世到其再传弟子）的集体编纂活动，这一活动决定了《论语》的特殊性质和地位。首先，《论语》虽然成书于儒学分化的背景之下，但由于是集体结集，当时的各派都参与其中，故其所反映的乃是众多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眼中的孔子，而不是某一人或几人所理解的孔子。这种理解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共同看法，反映了早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其次，《论语》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结集，得到孔门后学各派的认可，在孔门内部具有权威的地位。

四、《论语》的版本和注释

关于《论语》的版本和注释，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齐论语》中20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古文论语》21篇中，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400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以《鲁论》篇目为依据，整理出来的本子号为《张

侯论》。由于其时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地位显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作《论语注》。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今本《论语》，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计20篇，1.2万字。

《论语》的注本非常之多，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的不完全统计，到近代为止关于《论语》的文献竟达3000种之多。《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所以有许多注本。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仍然是以郑玄注本为据。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其他各家，在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经义考》，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近代有康有为《论语注》，民国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等，今注本有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南怀瑾《论语别裁》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论语》，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字数不足今本的一半，而文字差异多达700余处，分章上也有独特之处。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与《鲁论》较为接近。2016年的考古重大发现，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竹书《论语·知道》篇，很可能属于《齐论》，如果完全释读出来，将是《论语》版本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

五、《论语》的思想体系

《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基本上囊括了儒家的思想，它不仅是儒家经典的“圣经”，也是儒家思想的“圣经”。因为这个缘故，历史上才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练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在研究孔子学说时，常常要提到《论语》，有这样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论语》是比较可信的研究孔子学说的材料，研究孔子学说应该以《论语》为主；二是《论语》虽然可信，但是其中夹杂了孔门弟子的心得，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孔子学说了；三是研究孔子学说以六经为主。

《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进行归纳，我这里主要从两个大的层面加以概括，探究其思想体系的构成。

（一）道、德、天（命）、鬼神层面

在先秦，“道”意味着天道，表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德”意味着对天道有所得，即指人们认识“道”、遵循“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人称为“德”。“道德”一词意味着遵循符合天道的人之本性。所以，由道而德，尊道贵德，弘道崇德，就是人道与天道打通，天人合一，人的生活获得了终极根据。

《论语》有许多谈道论德的文字，有道与德分言，有道与德联言，如：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以上说明道和德是孔子《论语》中十分重要的范畴，无论是分言还是合言，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其他道德条目的本原和归宿。在孔子心目中，“道”为专一向往的最高本体，“德”为分得“道”本体面合乎道的伦理道德境界，“仁”与“中庸”都处于“德”的最高层次，也都因分得“道”而处于伦理道德之理想境界。相对来讲，“艺”“学”等就低一个层次了，可以说是应用层次。但即使在这个层次，也要超越而求道的本体。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王已经从效法天地之道而总结出了合理而可行的“德”，因此，完全可以据此而为人处世、修身治国。但是，人所立的“德”毕竟不可能完全揭示“道”的内涵，人的作为毕竟不可能完全符合“道”的原则，所以，在“据德”的同时，永远不能忘记时刻体认“道”、追求“道”的境界。因此，他特别强调“志于道，据于德”（《述而》）。那么，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道”是什么？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认为，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的，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新发现的帛书《易传·要》引孔子的话说：“《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易简之善配至德”，“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显然，在祝卜尚流行的时代，孔子主导思想是“复其祝卜”以“观其德义”。在当时，他与史巫是“同途”的，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求其德而已”——是“殊归”的。这样，就把属于“术”层次的祝卜提升到得“道”本体的“德”层次。

应该强调，孔子头脑中的道和德并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空泛

的所谓“道德”概念，孔子谈到道和德时都是与具体的人生和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如他谈人格修养过程，认为作为一个人应该认识“道”、追求“道”、献身于“道”，而且他还断定：“道”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不遵循的。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即是说“这个道”就像人们进出的门户一样，是天下众人所共同经由、共同遵守的。他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一以贯之”的“道”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的忠恕之道，也即是孔子“仁”学的核心。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段话显然是孔子考察了历史和现实而得出的结论。要复兴礼乐，他认为不能光讲礼乐本身，还要追溯礼乐背后的“道”——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规律、文化精神、社会理想、政治理念。孔子的“道”自然是承继春秋以来中国文化由天道转到人道的这一历史趋势而进一步探讨的，其传统资源主要是礼乐文化，其价值指向基本上是人文精神，其最后的归宿大体上是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这就使他的“道”具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意蕴。

在对“道”把握的基础上，孔子赋予“士”一种使命感，认为“士”应当“济世以道”。孔子认为“道”的追求具有绝对的价值，是一件必须“生死与之”之事，他不仅要求弟子“笃信善学，守死善道”（《泰伯》），坚定地相信它，好好地学习它，至死地守护它。甚至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话。孔子认为“道”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世俗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它相比，当然不能用世俗的东西来交换，假使“道”所体现的理想不能实现，也要坚守道而不能放弃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泰伯》）。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孔子希望弟子们能够“志于道”，要立志“弘道”，不要把“道”当作是弘扬个人名声的工具。曾子更进一步地阐述儒家的这种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士应当坚持“道”的理想，在得志的时候，“以道事君”，“与民由之”，“泽加于民”，甚至“兼善天下”。他施行仁泽的范围愈广，他的道